



不少校外体育培训机构受租金上涨、疫情等影响运营艰难,为此市政协委员顾薇玲建议——

有序引导 保障青少年体育锻炼空间



思想众筹

训获益。

场地租金不断提升

顾薇玲表示,现在不少体育培训机构面临“一课一消”资金监管方式对现金流要求提高、营销压力、成本压力、疫情助企纾困政策较少且未有效落实等运营难题,这就导致部分机构最终选择转型或退出市场,校外培训市场竞争大量减少。“比如,场地资源紧缺带来成本压力,较多体育培训机构使用户外场地或者‘金边银角’的改造空间,这些场地尺寸不完全符合新政策下的场地标准,需投入一笔不小的场地改造费。培训机构多采用租赁方式获取场地,在场地资源抢

占过程中,往往具有资本优势的机构能够抢先布局,导致场地租金不断提升。”

在顾薇玲看来,新增培训机构准入门槛提高,且新增机构的现金流需求比“双减”政策出台前至少增加一倍,否则前期无法维持正常开支。这些也成为难题。

另外,校外培训机构良莠不齐,同时受“双减”政策及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许多培训机构难以维持正常经营,面临倒闭或转型的现状,非正常停业事件时有发生,消费者担心培训机构教学质量下降,或者遭遇“退费难”“卷钱跑路”,导致消费者对校外培训的信心逐渐缺失。

激发行业发展活力

“体育培训要‘生存发展’,首先要适当放宽政策限制。”在提案中,顾薇玲建议对使用户外场地或者“金边银角”改造空间的存量校外体育培训机构,避免“一刀切”的做法,可适当放宽对其现有场地的要求,但机构需将设施、安全保障等要求落实到位。

鼓励学校与机构开展专业体育教育合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将优质的体育培训资源引入校园,同时鼓励学校场地开放使用,提高校园场地的使用率,保障青少年的锻炼频率。推动体育培训教学专业化标准化系统化,形成标准化

的课程体系,并将执教、教研人员的上岗要求落到实处,确保青少年能体验到专业的体育教学服务。

顾薇玲还建议建立提前干预机制,明确培训机构退出市场的特定要求,降低机构非正常停业的风险,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建立智能化预警机制,借助大数据手段和投诉举报等传统监管方式,加强对培训机构的风险预警和评估,提高对培训机构潜在风险敏感性和突发情况的快速处置能力;赋予行业主管部门相关执法权限,或者加强行业主管部门与执法部门的联动性,能够对培训机构违规行为进行查处,维护市场秩序。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本报讯(记者屠瑜)如今在上海,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有很多成功案例,但是更换老电梯却困难重重。今年市人代会上,市人大代表、金山区政务服务办副主任陆益建议,需打通各部门之间更换老旧电梯运行流程。

他介绍,本市不少住宅小区电梯超龄服役,一些老旧电梯已经到了运行极限,安全隐患丛生,有时候甚至会发关人事事故,屡次修缮的费用不菲,已经无法用简单维修解决问题。“我在调研中发现,居民对老旧电梯的更换愿望强烈,而且更换电梯要比加装电梯便宜很多,平均下来户均只有几千元,如果说再加上部分维修资金的支出,那么付出就更少了。”他说。

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居民往往会遇到一些阻碍。他分析,首先,本市目前执行的相关文件是《关于推进本市老旧小区住宅电梯修理、改造、更新工作的实施方案》(沪综管联办发〔2015〕3号)。该方案对更换电梯的流程和责任有着较为明确且合理的规定,但是因为操作较少,往往基层单位接到换电梯的任务后,不知道向谁进行申请,不知道具体的操作流程。

其次,小区不同楼栋业主对换电梯需求有差异。《实施方案》规定小区更换电梯申请主体一般由业主委员会开展,或由居(村)委会组织全体业主开展。但由于同一小区不同楼栋之间电梯情况会有不同,经常出现某些楼栋业主热情很高,但业委会

更换『超龄』电梯面临三大难

探索以楼栋为申请主体,明确费用分摊比例,市人大代表陆益建议:细化部门工作流程,

积极性不高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如果无业委会,直接组织召开全体业主大会更难,阻碍了换电梯工作开展。

最后,没有费用按户分摊比例指导标准,往往在前期极大增加了楼栋业主自我组织、自我协商的难度。

对此,陆益代表建议,第一,在原有《实施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工作流程,强调居民委员会的相关职责,明确其必须接受申请的情况等。区、街镇要加强与房管局、市场监管局等条线部门的沟通,将换电梯的各环节明确市、区、街镇各单位部门的职责,相关联系人,受理条件等。

第二,探索以楼栋为单位作为申请主体。在业主委员会或业主大会出面更换电梯有困难的情况下,要探索以楼栋业主为主体申请更换电梯。要明确如何召开楼栋业主会议进行决策,如何选出楼栋

居民代表,如何进行委托,如何书面征求意见等具体机制制度。

第三,各相关单位部门加强工作指导。上述流程中各有关部门及相关涉及部门应当积极主动对居民自筹费用换电梯事宜加强业务指导。要建立费用分摊比例的建议标准,包括按平方、楼层等分摊的详细比例,以免在前期出现居民间的矛盾。



两会影话

新代表说说 基层那些事

“阿拉都是基层来的新代表,就多说说基层那些事吧!”周明代表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来啦!几位来自黄浦代表团的新代表在会场前碰头。仔细瞧瞧,果然“够基层”!张丞俊代表(右一)是五里桥街道80后“小巷总理”,周明代表(左

一)是南京东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郁非代表(左二)是上海第一食品南京东路旗舰店的全国劳模,宋青代表(右二)是荷花池幼儿园园长。

基层无小事,代表们都要说点啥?且听下回分解。 本报记者 刘歆 姚丽萍 摄影报道

网约车太多 的哥收入锐减

市人大代表杨国平建议严控网约车数量并加强监管

本报讯(记者张钰芸)一边是上海巡游出租车的营运车辆数从5万辆减少到3万多辆,驾驶员月收入锐减;另一边是新增核发网约车运营证仍快速增长。再加上非法从事网约车运营的情况仍较普遍,严重冲击市场秩序。今年上海两会上,上海市人大代表、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国平提出,严控本市网约车数量过快增长、加强对租赁车从事网约车运营管理已是当务之急。

“受疫情影响和非法网约车的冲击,去年12月中旬以来,本市巡游出租车日均差次数仅10差左右,驾驶员日均营收仅约500元,都只有疫情前一半,车辆里程利用率不到50%,远低于行业监管要求的60%-65%合理水平。”杨国平表示,目前上海出租车驾驶员月收入从过去8000元到10000元,减少到五六千元,出租车企业也普遍亏损。曾经的“城市名片”陷入了行业困境。

但同样属于出租汽车的网约车规模快速扩大,6年内核发运营证总

量已超巡游出租车。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上海新增核发网约车运营证26118件,总数近6万辆。上海出租车(含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合计超11万辆。“这个数字远高于市交通委的顶层设计。”他表示,2020年,上海市交通委研究形成本市出租汽车行业改革顶层设计方案,提出以“总量调控、优化运价管理”为核心的总体实施思路,预测本市2025年出租汽车行业车辆需求总数约8.8万辆。合规的巡游车和网约车已供应饱和,违法网约车还在冲击市场。杨国平调查发现,本市有大量中小租赁汽车公司将租赁车用于专职网约车营运,估算目前3万辆左右,严重损害出租汽车和合规网约车驾驶员的合法权益。同时,大部分租赁公司在收取租金外,未能对从事网约车运营的车辆和人员行使管理职能,导致服务质量难以保证。网约车数量绝不是越多越好,发展规模供大于求以后,不仅会浪费车辆、道路和劳动力资源,还会

空耗政府在公共交通建设方面的投入。杨国平表示,从业者劳动强度增加,收入却持续下降,也让这个行业留不住人,“只有让驾驶员有合理的收入,大家才能有职业荣誉感,才能擦亮这张‘城市名片’”。

针对行业困局,他建议暂停核发网约车车辆运营证,遏制网约车过快增长。“在《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完成修订前,建议暂时停止本市网约车车辆运营证的新增核发。这种做法在我国大中型城市中已有不少先例。”在争取加快修订条例同时,杨国平还建议在修订中明确上海出租车总量调控的标准和手段,规划巡游车和网约车合理比例,为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还应继续加强对网约车非法运营行为和网约车平台市场垄断行为的监管和处罚,全面清退不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加强对租赁车非法从事网约车运营行为的监管处罚等。据悉,《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在1995年出台,距今已27年。